



2020年2月27日，在韩国江陵，人们排队领取免费口罩。

种效应表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一般性“心理-生理”问题，即表现在个体损害作用这个层面；二是人生态度、理想信念受到干扰，这种效应表现在社会群体层面；三是国民意志的从众性摇摆，这种效应表现在国家或民族的国民素质和共同理想层面。

就当前形势看，率先遭受疫情攻击的中国较好地应对了“生理-心理”双重挑战，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强效隔离检疫，为世界抗疫做出了巨大贡献，同时中国医疗和基层社会机构高度协同，主动干预和消除医学隔离中产生的负面情绪，让世界看到“中国抗疫”方案的优越性。俄罗斯政治评论家波罗热科提到，中国政府和人民所表现的高度团结与配合，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优势。但遗憾的是，这些努力却为西方国家某些势力所无视，反倒借题发挥，煽动针对中国的种族主义，谋求从高贸、科技、文化等诸多领域与中国“脱钩”，企图形成一道泛化的心理“隔离墙”，理由却是“避免自身安全被侵蚀”。

哈佛大学教授赫伯特·凯尔曼注意到，围绕新冠疫情产生的“异化隔离”，将不光针对中国，还会对准那些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或经济实体，这种借题发挥的“隔离”同矗立在全球各冲突地带（如巴勒斯坦、塞浦路斯乃至美国南部国境）的隔离墙是一个性质，“这不只是物理上的墙，而是制造不同人群

之间深深的怀疑和恐惧的具象化标志”。他认为，迥异于最终目标是“拆除”的医学隔离，出于持久分割乃至固化身份的隔离，只能制造愤怒和仇恨，“更糟糕的是，主动隔离者实际也将自己锁在牢里，只不过牢笼是形而上的、道德伦理的牢笼，令自身无法接触在冲突解决过程中必须接触的合作伙伴”。

俄罗斯《军事历史》甚至忆起活生生的案例，1920年，在华沙战役中被俘的约8万苏俄军人暴发流感，波兰政府采取任其自生自灭的政策，所谓的“隔离”伴随着食物短缺、没有医药和清洁水和刺骨的寒风，尤其是代号“7”的图霍拉集中营里，患病的战俘直接扔进战壕等待命运的判决。“上万人‘消失’在大地上，”20年后做了苏联俘虏的波兰军官、图霍拉营负责人之一马图谢夫斯基承认，当1939-1940年苏联“解放军”波兰东部，收容13万名波兰军人后，也就不能指望他们会有什么更好的待遇了。难怪美英等国16位国际卫生法学家刚在《柳叶刀》的发文：“基于恐惧、误传、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应对措施，不会将人们从类似新冠肺炎的突发事件中拯救出来。”

值得点赞的是，当加拿大多伦多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，对于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侵害下的华人餐饮业，更多的人站出来支持餐饮业并阻止一些商铺“临时关门”，2月18日，在多